

笔墨里的双城记

——作家王安忆的香港缘

“上海和香港的渊源太深了，这或许就是我和香港的前缘。”谈及与香港的羁绊，作家王安忆的话语里满是绵长的意绪。

20年前，她赴香港岭南大学担任驻校作家，成为该校创意写作课程的拓荒者之一；近日，岭南大学授予她荣誉博士学位，为这段跨越山海的文学缘分再添注脚。记者借此机会，采访了这位在当代文坛有着重要影响的女作家。

从三尺讲台到文学殿堂，从描摹城市风情到剖白创作本心，王安忆以细腻的笔触和通透的思考，勾勒出一条连接沪港两地的文学纽带，也铺陈出一位作家对时代、对创作的赤诚之心。

两座城的惺惺相惜

2005年的香港，给初来乍到的王安忆留下深刻印象。彼时，她受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、香港作家也斯之邀，前来教授创意写作课程。这是王安忆头一遭涉足创意写作教学，两个月的课程安排得满满当当，沪港之间的奔波劳顿丝毫没减弱她的投入。

“那段教学经历对我来说是个开端。”王安忆坦言，正是从香港回去后，复旦大学的创意写作专硕项目也跟着落地生根。促成这段缘分的也斯，让王安忆对香港文坛多了一份亲近。

20年间，王安忆与岭南大学的联系从未断过。她多次赴港参加学术会议，还参与过两届张爱玲学术讨论会。荣誉博士学位的授予，让这缘分有了沉甸甸的分量。

在王安忆眼里，香港和上海有不少相似

的地方。小时候，她身边好些同学的父母在香港打拼，同学长到一定年纪，去了香港生活。“在我们出生的年代，上海有了不少变化，而香港还留着些旧时印记，让我能在这里寻到一些记忆的影子。”王安忆说。

这份独特的城市共鸣，也化作了王安忆笔下的文字。她写过两篇以香港为背景的小说，也遗憾自己不会说广东话，“这样终究写不好（香港）”。

在她看来，粤语和香港的历史背景、社会文化肌理紧紧连在一起，“要是能对广东话多些了解，我笔下的香港会更贴合这里的生活”。即便如此，她的文字还是触动了香港读者的心弦，在文化交汇的土壤里，生出了跨越地域的共鸣。

创作与教学的双向滋养

“作家不是靠教出来的，但写作训练是有意义的。”谈及文学创作与教育的关系，王安忆话里满是坦诚。

2004年，王安忆到复旦大学任教，这个决定在当时引来不少质疑声。有人觉得，大学教学会占了她的创作时间，到头来怕是“书教不好，作品也写不出”。可王安忆却觉得，这段经历很值得。

她在复旦讲了整整一个学期，学生们自发记录的讲义，后来整理成了《心灵世界》一书。这本书如今被不少学校当作创意写作的教材。

王安忆认同一位法国女作家的观点——“写作不能教”，但她觉得写作课不是要培养“天才作家”，而是能让普通人“把书读得更深刻些”。

这些年，王安忆的写作视角与笔触悄然发生变化。早年她多聚焦女性个体的经验

与情感，后来随着人生阅历的沉淀，开始从寻常人物的身上更深入地挖掘时代印记。就像最近的作品《儿女风云录》里的那些上海男人，她年轻时只觉得他们平庸琐碎，待年岁渐长再回望，才读懂这类人物背后的社会底色与个体韧性。

如今，王安忆已经退休，但对文学的热情半分没减。她曾说计划“60岁就不写长篇了”，因为长篇创作太耗时间精力，就像体力活。可60岁那年，她的一部长篇小说刚写了一半，只能硬着头皮写完。没想到，写完之后新的灵感又接二连三冒出来。

“写作不是想保持就能保持的，关键是有没有兴趣。”王安忆笑道，“当你还能从写作里尝到乐趣，就会乐此不疲地写下去。名和利，哪比得上这份乐趣哟。”

对于往后的日子，她没什么刻意的规划，只愿跟着兴趣走。

文学、市场与时代

在王安忆的文学世界里，装着对当下文坛的细致观察与通透思考。

她回忆道，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浪潮刚起时，不少作家受市场影响，总想迎合读者口味。在她看来，“市场并非洪水猛兽”，斯蒂芬·金的通俗小说、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侦探故事，都是既叫好又叫座的作品。

“市场有优劣淘汰的机制，这很科学。人们爱看的书自然卖得好，没人看的书就慢慢被淘汰了。”王安忆说。

聊起当下文坛中的人与作品，王安忆对马来西亚女作家黎紫书和她的《流俗地》赞赏有加。在她看来，字里行间满是人生的风貌，读完后让人忍不住回味思索。她直言，作家的进步本就不是易事，哪怕创作过程伴随着挣扎与阵痛，都是前行路上的印记。

她留意到，如今视听媒介越来越发达，

年轻人更爱追剧、刷短视频，对文字阅读的兴趣渐渐淡了。对此，王安忆并不悲观，她认为“文字是慢东西”，读者有一定的文学修养，就能品出其中的好。

王安忆始终记得沪港那份深刻的双城渊源，曾想写一个用香港命名的传奇——“它提炼于我们最普通的人生，是将我们普通人生中的细节凝聚成一个传奇”。

“我很喜欢也很想念我的香港学生。”这份惦念，也化作了她对香港年轻写作者的期许。她希望他们多去触摸脚下的土地，从中找到创作灵感，找到属于自己的表达。

据新华社

《太平年》热播： 以“纳土归宋”为脉 照见“天下太平”之愿



“能得饮太平年下一杯热酒”——电视剧《太平年》中，钱弘俶、赵匡胤、郭荣等在血战后的汴梁城墙上许下的这一愿望，不仅定格了乱世中最动人的一刻，更击中了当下观众的心。

2026开年，重大历史题材剧《太平年》在多平台播出，引起广泛关注。这部作品聚焦五代十国这段“相对冷门”的历史，以“纳土归宋”为核心线索，跳出传统历史剧的权谋战争套路，凭借扎实的考据与价值表达，成为近年来历史正剧创作的亮眼之作，也让观众重新认识了这段政权更迭频繁却蕴含文明韧性的时期。

《太平年》的突破，始于对历史叙事“空白地带”的触碰。五代十国因政权频繁更迭、史料零散，长期游离于影视创作边缘，被观众戏称为“散装历史”。该剧编剧董哲深耕史料，最终以“太平”为核心度量衡，搭建起两代人的叙事框架——老一代以冯道、郭威为代表，是乱世秩序的艰难维系者；年轻一代以钱弘俶、赵匡胤为引领，在时代博弈中坚守理想。

据介绍，该剧创作团队从最初就确立了“现实主义历史剧”的方向。总导演杨磊将执导高口碑剧集《三体》的考据精神延续至此，强调“所有事情都要考据”。为还原五代风貌，剧组打造38000平方米场景，制作8000多套服装，单套盔甲重达40多斤、包含2800片甲片……对细节的极致追求，也融入台词设计——偏文言质感的表达虽抬高了观剧门槛，却让历史场景更具可信度。

该剧值得被看到的重要价值之一，还在于将历史事件升华为对文明命题的追问。剧集并非简单复刻历史，而是聚焦“太平”的本质——钱弘俶“舍一家一姓之荣，保千万生灵之安”的抉择，郭威“决定天下命运的，不只有长枪大剑，还有小户人家的隔夜粮米”的认知，赵匡胤结束乱世的抱负，共同指向“民为邦本”的核心。

剧集中“共饮一杯热酒”这一场景之所以动人，正在于它超越了具体的历史情境，触动了人类对平安宁的普遍渴望。千年前的人物对太平的向往，与当下观众的情感产生了共鸣。

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对话，恰恰是《太平年》试图建立的桥梁。董哲认为，历史剧创作的最大意义在于通过历史观照现实。《太平年》的深层价值，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、统一性、和平性等高度契合。“历史的洪流纵然曲折，但人心向背、苍生福祉永远是衡量一切抉择的终极尺度。”据中新网

作家王安忆接受记者采访。

